

# 第一部分

# 東南亞的中國文化與 新加坡的華族文化熱

## 前言

中國與東南亞的交往有比較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在明代鄭和下西洋以後。鄭和下西洋的歷史雖然短暫，但對東南亞社會和人民有深遠的價值，其影響及效應在數百年後仍不斷擴散，對我們了解東南亞華人的歷史和文化認同，有重要的意義。鄭和自永樂三年（1450）至宣德八年（1433）的 28 年間，曾七次率領超過 27,000 人、300 多艘船的船隊訪問東南亞、印度洋及非洲東岸的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sup>1</sup> 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記憶成了東南亞華人精神寄託的象徵，也成了當地土生華人的身份認同依據。

本章嘗試剖析明清以來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和扎根，從而探討中國文化在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影響。本章並以新加坡作為案例，分析近年新加坡的中國文化熱潮，與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根深蒂固和中國的崛起有密切的關係。

---

1 詳參 Lee Cheuk Yin ed. (2005). *Zheng He and Maritime Asia*,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中國文化在東南亞

文化是一個民族發展和壯大的重要資源，文化越是深厚的民族，它的民族性越強；相反地，缺乏文化資源的民族，亦缺乏民族的自信。但文化的形成並不是單一的，眾所周知，文化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成果，涵蓋一個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政治制度、社會組織、文學藝術、宗教思想、民生習尚等，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以中國文化為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優秀的民族，在幾千年漫長的發展中，創造了豐富、燦爛的文化傳統，而這個文化傳統通過不斷地吸收外來的養分，進一步壯大，並形成了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體系，造就了東亞文明的誕生，所以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中國文化與東南亞的關係，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

我們可以把東亞及東南亞作為兩個文化區域的地理範圍來看，<sup>2</sup>而這兩個文化區域又是互相影響的。因為文化的範圍廣泛，這裏所指的文化區域，是由一種或多種相互有聯繫的文化特徵所形成的「形式文化區」(formal culture region)，並非受政治、經濟或社會功能影響而形成的「功能文化區」(functional culture region)。<sup>3</sup>例如，過去學術界會把東亞文化區根據其不同特色加以界定，如以使用漢字的國家作為範圍的「漢字文化圈」<sup>4</sup>、以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地區為範圍的「儒家文化圈」、以使用筷子的民族為類別的「筷

---

2 有關文化區的討論，可參考 Terry Jordon (1990). *The Human Mosaic—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3 參考張曉虹 (2004)。《文化區域的分異與整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頁4。

4 參考溝口雄三、富永健一等編 (1992)。《漢字文化圈の歴史と未來》。東京：大修館書店。

子文化圈」，甚至以媽祖信仰流播地區為分類的「媽祖文化圈」。<sup>5</sup>比較普遍及廣泛使用的是「漢文化圈」或「中華文化圈」的劃分。「文化圈」所指的文化地域，也有稱作文化帶，它實際可以看作是人類生活環境、生活樣式的共同場合、地帶及區域。文化圈的形成，同時又表示着一個歷史的演變過程，表示着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的持續過程。<sup>6</sup>北京大學陳玉龍等學者在分析「漢文化圈」的觀念時指出，漢文化以漢字為載體、以漢族為主體，至於成為文化圈，他說：

如果以語言來劃分，古代亞洲曾經存在着三大文化圈，即：以阿拉伯文為中心的西亞文化圈；以梵文為中心的南亞文化圈；以漢文為中心的東亞及東北亞文化圈，亦即「漢文化圈」。「漢文化圈」的形成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中國東臨滄海，北連大漠，西為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所阻，這就很自然地促成其文化走向為向東、向東北、向東南流。文化交流的走向往往是由高處向低處流，由實處向虛處流，其勢有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有人把漢文化的傳播比作「水銀瀉地」倒是很確切的比喻，也可以說漢文化就像磁石那樣對遠近各國具有強大的吸引力。<sup>7</sup>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東南亞文化圈是最多元的，因為它同時受到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因為漢字是漢文

---

5 李焯然（2004）。〈媽祖文化圈與海外華人的社會和信仰〉，《媽祖研究學報》第一輯。吉隆坡：馬來西亞雪隆海南會館天后宮媽祖文化研究中心。頁 26-32。

6 參考陳玉龍、楊通方、夏應元、范毓周（1993）。《漢文化論綱：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8。

7 參考溝口雄三、富永健一等編（1992）。《漢字文化圈的歷史與未來》。東京：大修館書店。

化的載體，也是傳播漢文化的重要媒介，所以漢文化和漢字文化是分不開的。在亞洲，漢字文化圈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歷史又綿延不斷的文化圈。在這個文化圈內，以華夏文化為中心，創造了東亞地區輝煌的文明。由於歷史的和地理的條件，漢字隨着漢文化東傳朝鮮、日本，南播越南、東南亞，形成漢字文化圈，亦即廣義的漢文化圈。韓國、日本、越南，這些東亞國家雖然現在都有自己的文字，但不難看出，三國的文字都來自同一個淵源——漢字。而且，地理上的位置、水陸交通的便利，造就了這幾國民族的緊密接觸和文化交流。而日、韓、越三國雖然早期全面吸收漢文化，但又有所創新，大大地豐富了漢文化的內容，共同創造了具有特色的「漢文化圈」或「東亞文化圈」。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是經歷了悠久的歷史和迂迴的發展脈絡，代表了世界上延續最久、影響最大、覆蓋面最廣的文化區域。而中國文化對東南亞的影響，是表現在東亞和東南亞兩個文化圈的互動和相互吸收。

## 移民與中國文化傳播

一般人談到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會提到中國歷史上的明代鄭和下西洋事件。比較大規模的官方接觸和人民來往，可能是從鄭和下西洋開始，但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往來和隨之而來的文化接觸應該更早。這個傳播與接觸的路線，就是近年最熱門的海上絲綢之路。新加坡國立大學 John Miksic 教授的著作 *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sup>8</sup> 根據考古的發現，指出新加坡在

---

<sup>8</sup> John N. Miksic (2013). *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 Singapore: NUS Press.

元代的時候已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繁忙貿易港。歷史家羅香林先生對中國宋代與東南亞的香藥貿易的研究，也證明了兩地的早期文化接觸和貿易往來頻密。

中國文化得以移植，在東南亞落地生根，除了有賴少數的儒家精英外，主要是通過移民的傳播。自明清以來，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大量居民飽受戰亂，迫於生計移民東南亞，為中國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新加坡就是一個移民社會，1819年萊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的時候，新加坡的人口只有150多人，其中華人只有30人。當時的新加坡是屬於廖內柔佛帝國。早在此以前，英國人已在1786年開發檳城（Penang），其後又取得馬六甲（Malacca），並在1826年組成「英屬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sup>9</sup> 隨着中國移民的大量到來，華人人口亦直線地上升。1860年的時候，新加坡的華人口從1830年的6,500多人增加至50,000多人，到1947年，華人人口已經有690,000人。而華人在新加坡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也不斷提高，根據1947年的統計，華人在新加坡的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比已經從1871年的59%增加至74%。<sup>10</sup> 隨着中國移民陸續南來，華人的文化、習俗、宗教信仰也隨之而來到新加坡，而地緣色彩和方言幫派與早期的移民群體有密切的關係。

早期東南亞的華人移民主要來自中國的廣東、廣西和福建省，其中又以來自城郊及鄉村地區者居多。他們在移民的過程中不僅開

---

9 K. L. Sudderuddin, ed. (1986). *Singapore 1986*, Singapor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pp. 8–29.

10 參考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45表3-1；頁52表3-2。

始在東南亞生活，適當地環境的需要，同時也把社會習慣和信仰帶到東南亞，使中國的民間文化得以在其他地區發展、傳播。華人移民將文化和信仰帶到東南亞，其實象徵着他們與家鄉的關係與情結，於是新的定居地便成了家鄉的一個延續。方言與地域無形中成為華人群體裏團結各個社群在一起的重要聯繫。<sup>11</sup> 方言與地域在自我認知上的結合，又與華人移民所享有的文化自由不無關係。

早期的東南亞華人移民是所謂的「過番客」。他們仍視中國家鄉為依歸，只把移居地看成是謀求生計的中途站，不將它當成是落地生根的歸宿。這些移民隻身到東南亞討生活，家眷都留在中國家鄉，往往通過宗親會館和地方神靈崇拜的地域性質，傳達對家鄉的思念和延續。例如新加坡天福宮是福建方言群供奉媽祖的廟宇，也是新加坡最具歷史和規模的廟宇之一。天福宮始建於 1839 年，完成於 1842 年，本來是為所有華人而建，並不屬於任何一個方言群。<sup>12</sup> 廟內有〈修廟碑〉記載：「天福宮宗祀聖母神像，我唐人所建也。……我唐人食德思根，公議於新加坡以南直隸亞箕（直落亞逸）之地，創造天福宮，背戌面辰，為崇祀聖母廟宇，……並為我唐人會議之所也。」唐人即泛稱本地的華人，無所謂籍貫的分別。這種心態與文化延續，到今天還是不知不覺地保留在東南亞華人的文化中。但因為率先倡導修建此廟的是福建僑商陳金聲和陳篤生二人，他們既出錢又出力，因此後來也多為福建人控制領導權，無會所的福建人也多在該處舉行祭祀、會議、聚會，遂使天福宮成為了

---

11 Maurice Freedman (1960). "Immigrants and Associations: Chinese in Nineteenth-Century Singapo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 1 (October), p. 43.

12 有關天福宮的歷史，可參考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宮〉，載林孝勝等編（1975）。《石叻古跡》。新加坡：南洋學會。頁 47-56。

福建會館的前身。<sup>13</sup> 因為這樣，地域神祇信仰和會館組織有着不可分解的關係，除了宗教職能，也為早期的移民提供了生活、謀生、仲裁、消遣的功用。

## 中國文化與東南亞文化的接觸

國際間的交往，文化接觸是當中最重要和影響最深遠的環節。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文化交流頻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範例。有些學者更認為人類文明的總趨勢是走向全球化、一體化。<sup>14</sup> 究竟是趨向「分歧」還是「聚合」，眾說紛紜。

過去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是由中心到邊緣的擴散。中國古代的華夏與四夷觀念，對早期的民族往來和文化交流產生了一定的阻力。內外、華夷所形成的秩序和尊卑關係，更根深蒂固地成為了中國人天下觀的基礎。但在中國歷史上，「華夷有別」和「天下一家」卻常常是對外政策的矛盾對立。邢義田認為這兩種看法在每個時代皆或隱或現地同時存在着，二者也不一定完全互相排斥。當中國國力豐厚，充滿自信時，如漢、唐、明、清之盛世，以天下為一家的理想往往抬頭，使中國文化或政治力量有向外擴張的傾向；當中國國力不振或遭受外來的威脅，如唐安史之亂以後，兩宋以及明、清易代之時，閉關自守，間隔華夷的論調又會轉盛。<sup>15</sup> 漢、唐以

---

13 詳參賴世昭（1995）。《新加坡華人的天后信仰》。第4章第1節，頁14-24。

14 有關這方面的意見，尚可參考湯一介〈文化的多元共處：「和而不同」的價值資源〉，載樂黛雲、李比雄主編（1998）。《文化對話》第1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頁8-13。

15 邢義田（1981）。〈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見《中國文化新論：永恆的巨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425-478。

後，漢文化的向外傳播和外來文化的來華，創造了文化交流和互動的空間，也漸漸改變了中國人的天下觀。<sup>16</sup> 雖然如此，但政治、文化上的內與外、中心與邊緣的觀念，仍然難以改變，影響所及，日本在 18 世紀設立大學以後，不久就以「中國」自尊，並視大唐與高麗為「外藩」。<sup>17</sup> 而越南陳朝在抗拒明朝駐兵安南之際，自稱為「中國」、為「華」，斥明為「夷」。<sup>18</sup> 但政治上的立場對壘，並沒有影響兩國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日本、韓國、越南等國的政府架構、教育制度、禮樂服飾，都曾經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漢文化也往往成為這些國家進行改革的動力。

近代東亞歷史的發展使不少學者對東亞的文化傳統提出了新的審視。過去半個世紀，中國的政治運動使傳統文化和民間風俗面對極大的挑戰。相反，中國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如南韓、日本、台灣、新加坡，除了經濟發達之外，也加速傳統文化的發揚與保存，尤其是在禮俗文化和傳統信仰方面。<sup>19</sup> 所以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文化中國」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已經有所改變，邊緣也可以成為中心。<sup>20</sup> 地理因素在傳統文化圈的意義上，已經產生了新的詮釋，中心擴散的傳統觀念，也隨着文化中心的轉移而重新規劃。隨之而來的，可

---

16 有關討論可參考葛兆光 (2002)。《古代中國社會與文化十講》。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第一講：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頁 1-26。

17 參考朱雲影 (1981)。《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 6。

18 參考李焯然 (2003)。〈朱子思想與越南儒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12 期，頁 453-471。

19 有些學者便指出新加坡重視儒家倫理和推行儒家倫理教育，是隨着經濟發達但人民心靈空虛而來的。可參考楊憲邦〈東亞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載張立天、町田三郎編 (1992)。《傳統文化與東亞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47-61。

20 參考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Daedalus (1991).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Vol. 120, No. 2. pp. 1-32.

能是新的中心，或者是不同的中心。雖然東南亞每個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同時都能反映出不同的本土特色。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李元瑾教授在分析東南亞華人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保存時指出，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三國具有不同的特徵，從各個層面比照該地華人的境遇和傳播中華文化，可以反映出脫離殖民地時代的東南亞國家華人保留其中華文化傳統的三種「保根模式」。新加坡是以政治主導的「以文保根」模式；馬來西亞是以教育主導的「以校保根」模式；印度尼西亞是以宗教主導的「以教保根」模式。

李教授根據新、馬、印三種模式的進一步比照——從同軌到分散；從互動到疏遠；從中國元素主導到本土元素主導；從同受西方文化和回教文化挑戰，並作出不同反應，以及分別以不同的語言保留，前瞻性地提出三種模式的未來發展與思考——新加坡不可能復興華校，「以文保根」的道路將繼續下去；馬來西亞的華教尚在發展中，「以校保根」之路會延伸，華人人口比例下降和人才外流的情況令人擔憂；印度尼西亞的孔教有局限性，但華文教育方興未艾，今後會繼續保留中華文化，不會僅限於「以教保根」。<sup>21</sup> 以上分析針對不同國家的國情和當地華人的際遇，提出了針砭時弊的立場，同時反應了中國文化傳播在東南亞的不同命運。

---

21 李元瑾《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新馬印三國比照》，曾在廈門市華僑博物院演講，其更為詳細的分析見〈儒學在東南亞的承傳：新馬印之比較研究〉，見魏月萍、朴素晶編（2016）。《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

## 中國的崛起與中國文化熱

近年隨着中國的崛起，西方有學中文熱，東南亞則有中國文化熱。中國文化如雨後春筍般在東南亞生根發芽，也可以從近年新加坡的中國文化熱去理解其發展和微妙關係。

2015年，中國在新加坡建設第17所「中國文化中心」，這也是唯一位於東南亞、而且是華人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繼孔子學院以後，中國近年在海外設立中國文化中心，是進一步加強對外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戰略選擇，但這也不是風平浪靜的，如2013年國家漢辦在葡萄牙的歐洲中國學年會中鬧出的風波，導致歐洲中國學學會會長在網頁上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聲明，嚴重影響了中國軟實力的形象。

中國至今在海外的其他文化中心，分別設於非洲的貝南和毛里裘斯、南韓首爾、埃及開羅、法國巴黎、日本東京、蒙古、馬爾他瓦萊塔和德國柏林。其他在泰國曼谷、俄羅斯莫斯科、西班牙馬德里的文化中心正在建設施工中。在塞爾維亞、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墨西哥、加拿大、日本設立文化中心的工作也已進入選址階段。此外，中國又與匈牙利、意大利、印度、英國、西班牙等14個國家簽署互設文化中心的合作備忘錄，大概在未來五年，中國文化中心將遍佈全球。

新加坡的中國文化中心位於市中心的奎因街（Queen's Street）217號，路口是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鄰近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是新加坡著名的文化地帶。基地面積達1,352.6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為5,680平方米，包含文化交流、教學培訓、信息服務等功能。中心